

断肠殇

——朱淑真接受与研究思辨

董军平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断 肠 殇

——朱淑真接受与研究思辨

董军平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断肠殇: 朱淑真接受与研究思辨/ 董军平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18-1090-6

I. ①断… II. ①董… III. ①朱淑真-诗词研究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0412号

断 肠 殇

——朱淑真接受与研究思辨

董军平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群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5年 12月第1版 2015年 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090-6
定 价	32.0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导 言

自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断肠集序》形成以来，宋女郎朱淑真（生卒不详）及其诗词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是，朱淑真在宋代并未受到文人应有的关注而显得相对寂寥无闻，李清照自然是时代的宠儿而备受瞩目。对此，王兆鹏先生从家庭和文坛背景分析了李清照、朱淑真在宋代一显一晦的原因，认为“孤立无援的朱淑真，命中注定只能在默默无闻中创作，任其作品自生自灭，根本不敢奢望‘生前身后名。’”且“朱淑真孤独封闭的生活和创作环境，限制了她与文人士大夫的联系，她的才名、她的作品也就难以进入到主流社会和上层文坛。”^①通过比较和分析，王先生认为“古代作家的知名度，除了文学的自身成就外，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文坛背景、师友渊源和人际交往以及社会政治地位等有着密切的关系。”^②与王先生从非文学的因素进行比较和分析不同，演妮则从才华实力、情感道德评判、接受男性规范的熟练程度和现存资料的完备程度四个方面分析了朱淑真备受冷落的原因，认为朱淑真不仅偏离了男性文学这一文坛评价的主要杠杆，不符合儒家诗教规范，而且连最基本的研究材料都严重不足，加上才华稍逊，必然不被宋代

① 王兆鹏，《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86页。

② 同上。

文人所欣赏。^①牛春俐则另从题材范围及写方式方面指出淑真题材狭窄，局限于闺阁，及个人化的、纯女性的书写方式，难以让封建士大夫认可^②。总之，朱淑真在宋代的寂寥无闻既有文学方面的因素，亦有非文学方面的因素。

但是，随着时空的变化，朱淑真自明代时起她的文名与声名逐渐雀起，并渐渐与李清照齐名“并称隹才”^③而成为“名家”^④。朱淑真成功地完成了蜕变。

朱淑真的蜕变与其丰富的诗词作品有关。朱淑真在宋代默默无闻，但却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作品堪称丰富；尽管作品曾被父母焚毁而百不一存，但今存《断肠诗集》前集十卷、后集八卷、补遗一卷，共 337 首；《断肠词》一卷（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收其作 27 首，另 8 首与他人词作互现）；疑文（《璇玑图记》）一篇。从作品数量来看，朱淑真的诗词作品远远高于其他女性，“唐宋以还，闺媛篇什流传之多，无过淑真者。”^⑤但作品数量的多寡并不能成为衡量和判断一个作家历史地位的标准，如唐代诗人张若虚，生卒、字号均不详，诗歌仅存两首，然《春江花月夜》却足以奠定他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朱淑真诗作多于词作，几近 10 倍，然“其诗浅弱，不脱闺阁之习”，相反，使她成为“名家”的则是其“清新婉丽”的词作。所以，丰富的诗词作品只是朱淑真能够实现蜕变的基础。

① 演妮，《探究朱淑真备受冷落的原因》，《大众文艺》第 18 期第 139—140 页，2010 年。

② 牛春俐，《朱淑真诗词接受史解析》，《名作欣赏》第 18 期，

③ [清] 许玉琢《校补〈断肠词〉序》，转引自张璋、黄畬校注《朱淑真集》，第 30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6 月版。

④ [清] 薛绍徽，《黛韵楼文集》卷下《李清照朱淑真论》：“赵宋词女，李朱名家。”见冀勤《朱淑真集注》第 327 页，中华书局 2008 年。

⑤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 43~4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7 月版。

朱淑真的蜕变与其不幸的生命历程有关。正如王兆鹏先生《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一文中分析后认为：“除了她的才情和诗词成就之外，……那就是她作为才女的不幸命运。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她诗词写的好但未必能吸引人，她不幸的婚姻，佳人薄命，却足以让人回肠断气。”^①同时，王先生从更深层即明朝的社会文化分析了朱淑真声名雀起的原因可参，此不赘述。

朱淑真的蜕变更与历代文人对其诗词的接受与研究有关。所谓文学接受，即受众或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态度，“它既包括专门家的理论、批评活动，更包括广大普通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欣赏、评判等接受态度。”^②换句话说，凡是对文学作品的一切态度，都属于文学接受，这其中也包含蔑视的态度。而文学研究则是建立在文学接受的基础上，是接受的延伸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讲，文学接受与研究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很难厘清二者的界限，“这是因为，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接受与研究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接受是研究的前提，研究是接受的延伸和深化。”^③又，文学的接受者与研究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也就是说，文学的接受者亦或成为文学的研究者，而文学研究者首先是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读者。所以，我们很难将接受与文学研究区分。当然，文学接受与文学研究难以区分还在于对象的同一性，即文学作品这一客观存在。所不同的是，文学接受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对象、以读者为主体、力求把握本文深

① 王兆鹏，《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第190页，《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② 王金山、王青山，《文学接受研究》，第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③ 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绪论》第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层意蕴的积极能动的阅读和再创造活动；而文学研究是通过文学文本的阅读，来探究文本的深层意蕴，且文学研究“包括了资料的搜集、史料的勾稽、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等更为丰富的内容。”^①就朱淑真的蜕变而言，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且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相对寂寥无闻、以文本接受为主的宋代。朱淑真诗词作品丰富，是宋代女性文人之最，但除了魏仲恭、王唐佐、郑元佐、孙寿斋等少数下层文士的关注外，几无其他知名文士对其诗词进行品评，南宋几部重要的词选皆未选录其词，在宋人看来，“能文妇人，只有李易安和魏夫人”^②，而淳熙年间“能继李易安之后，清庵鲍氏、秀斋方氏。”^③也就是说，朱淑真不仅不及李清照和魏夫人，甚至不及未有作品存世的鲍氏和方氏。南宋末的刘克庄编《后村千家诗》和谢枋得编《千家诗》时分别选录了朱淑真诗歌，尤其是《后村千家诗》选录朱淑真诗歌多达62首之多，这从一个侧面放映了朱淑真诗歌在南宋末年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被主流社会所接受。”^④但该诗歌选集只选不评，对于我们认识朱淑真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帮助不大，但对于朱淑真诗歌的辑存和后世的补遗、校勘有所帮助。

第二，接受与研究相交融的元明清三代。宋人对朱淑真的接受与研究是以文本的接受为主，除魏仲恭和孙寿斋外，鲜有知名文士

① 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绪论》第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游艺论》，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

③ [宋]张端义，《西台集·贵耳集》，第7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④ 李静，《朱淑真诗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五期，第90页。

对其作品进行品论。进入元代后,“朱淑真,有诗集。”^①这说明,元代文人知道朱淑真的诗集。又元代杨维桢也对朱淑真进行了品论:“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出于小听挟慧,拘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②从杨维桢的品论来看,并未对朱淑真包括李清照的作品给予赞赏和肯定,反而提出了批评。明代是朱淑真声名和文名雀起的时期,文人士大夫对朱淑真诗词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断肠诗集》、《断肠词》版本繁复多样,传播甚广^③;同时,文人士大夫对其诗词的品论逐渐增多,朱淑真在文学史的地位得到了初步的承认和确立。如杜琼《题朱淑真梅竹图》中云:“夫以朱氏,乃宋世能文之女子,诚闺中之秀,女流之杰者也。”^④明代文人士大夫在品论朱淑真诗词的同时,也将关注点投放到了朱淑真的生平事迹上,朱淑真及其丈夫的形象在明代文士那里得到了重塑。清代学术是对前代学术的继承和延续,但清代考据学发达,批评的继承前代学术,在接受朱淑真诗词的同时,也对前人的观点勇敢地提出了质疑,如对《生查子·元夕》一词的作者、淑真为朱熹侄女以及淑真牵情于才子、朱淑真的家世、生平事迹、婚恋等问题进行了辨析和考证。总之,从宋至元,再至明清,朱淑真从相对寂寥,逐渐超越魏夫人等其他女性,成为文学史尤其是宋代女性乃至中国女性文学史上能与李清照比肩之人,这一历史的蜕变与文人士大夫乃至普通民众对她和她诗词诗词的接受与研究息息相关。

① 佚名,《氏族大全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见冀勤辑注《朱淑真集注》,第291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③ 参见王兆鹏《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④ 杜琼,《杜东原集》,见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190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深入与多元化的近现代研究。近现代是以研究为重点的，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朱淑真及其诗词的研究逐步走向细致深入和多元化。上个世纪 30—40 年代，学界对朱淑真的接受与研究是以考订她的身世、家世、籍贯、丈夫、情人、死亡为主，对作品本文的研究不够。60 年代以后，朱淑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研究者以阶级分析的眼光来透视和分析朱淑真的心灵世界，并揭示其悲剧命运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强调其诗词的社会意义，可以说，朱淑真不幸命运及其诗词的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挖掘，同时，朱淑真也成功地被塑造成一个反封建、反礼教的英雄，成为一个封建叛逆女性的代表。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西方女性文艺理论的传入，朱淑真及其诗词的研究又增添了新的话语，如女性意识、孤独意识、生命意识（含觉醒意识）、女性特色等等。可以说，对朱淑真诗词的接受与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其人其作的生命在接受与研究中得以延续和升华。

可以说，自宋时起，朱淑真及其诗词的接受与研究已经走过了近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沿革中，朱淑真及其诗词的历史生命在接受者与研究者共同努力下得到延续和升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的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①也就是说，朱淑真的文名和声名以及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历代接受者与研究者在接受和研究的中共同赋予的。

与此同时，在古今近千年的接受与研究中，亦存在一些值得重

^① 尧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6 页。

新思考甚至拷问之处。以“幽栖居士”这一别号为例。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不见宋元载记而出自清人王士禛（1634—1711）《池北偶谈》十五“朱淑贞《璇玑图记》”条：“绍定三年春二月望后三日，钱塘幽栖居士朱氏淑贞书。”^①对这一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云：“王士禛记康熙辛亥见淑真绍定二年手书《璇玑图记》一篇，备录其文于《池北偶谈》，且称《断肠集》不载此文。诸家撰闺秀诗笔者，皆未之及云云。然流传墨迹，千伪一真。此文出淑真与否，无从考证。疑以传疑，故存是一说可矣。”^②也就是说，《璇玑图记》是否为朱淑真所作是值得怀疑，是不能确定的。如此，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就值得重新思考，此其一。其二，《璇玑图记》为朱淑真所作，并加有“小朱”印章，然朱淑真卒于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之前，然“绍定三年”即1230为南宋理宗年号，几近南宋末年，一个已经逝去的人，何以能手写《图记》。清人况周颐认为是“绍熙”之误，但这是以淑真为北宋人为前提的的一种“纠错”。若按当下朱淑真为南宋人的普遍共识，“绍定”亦有可能为“绍兴”之误。其三，王士禛称自己亲见朱淑真手书《图记》，并有小朱印，然朱淑真却将自己的名字写成“淑贞”，当下学界也大多认为“真”与“贞”同，也就是说“朱淑真”与“朱淑贞”是同一个人，或者说“朱淑真，又名朱淑贞”，但“真”与“贞”终究不同，况作者是不会将自己的名姓写错。其四，朱淑真诗歌中多用典故，然与《璇玑图》相关的人和事并未在朱淑真的诗歌中出现，这很难相信朱淑真曾手书《璇玑图记》，并解读过《璇玑图》。五，存疑用伪。对于王士禛《池北偶谈》所记，古今学者均对此提

①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第36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宋代卷），第190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出了质疑，也就是说，《璇玑图记》是否为朱淑真所手书是存疑甚至为伪作是一种共识。然而，古今文人在论证过程中，却依然坚信《池北偶谈》中所记，如依据其中所记“家君宦游浙西”的记载，认为其父亲为官，而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早已成为共识。

总之，在朱淑真及其诗词近千年的接受与研究史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围绕朱淑真及其诗词的问题在接受与研究中逐渐的明晰，朱淑真已经不仅仅能与李清照比肩，她已经被格式化、类型化，甚至符号化，朱淑真及其诗词在接受与研究中已然发生了变异，对此，本文将对朱淑真及其诗词研究中的一些变异现象进行思辨，故名曰《断肠殇——朱淑真接受与研究思辨》，以期能为还原朱淑真及其诗词的本色。

目 录

导 言·····	01
第一章 《断肠集序》之殇·····	01
第一节 魏仲恭与《断肠集序》·····	02
一、魏仲恭事略·····	02
二、家世·····	04
三、交游、学识·····	07
第二节 序文内容·····	10
一、序文内容·····	11
二、《断肠集》的性质·····	17
第三节 魏序的价值与影响·····	19
一、补史之缺·····	19
二、元代以前唯一一篇由士大夫为女性别集撰写的 序文·····	22
三、魏序是朱淑真及其作品最早的研究成果·····	28
第二章 诗词接受与研究之殇·····	38
第一节 宋代的接受之殇·····	38
一、“好事者”之殇·····	38
二、诗歌的接受·····	44

三、选本接受·····	51
第二节 朱淑真诗词的当代接受与研究·····	56
一、文本的接受·····	56
二、当代研究的变异·····	63
第三章 时代之殇·····	67
第一节 古今之论·····	67
一、明清始乱·····	67
二、今人之论·····	72
三、混乱原因分析·····	75
第二节 古今之弊·····	77
一、“以诗证史”之弊·····	77
二、魏夫人与北宋人之误·····	80
三、地点与南宋人之论·····	84
第三节 生活年代思辨·····	99
一、诗中景观之花木类·····	99
二、人文景观·····	102
三、词选与生活年代·····	104
第四章 身份之殇·····	109
第一节 新旧之别·····	109
一、旧说·····	109
二、新说·····	112
三、父亲为宦说·····	115
第二节 身份的转变·····	120
一、宋代婚姻制度·····	120
二、官员选任制度·····	124
三、诗歌与市井民家情结·····	128

第五章 死亡之殇·····	132
第一节 “不贞”与“赴水”之弊·····	132
一、“不贞”与“赴水”之形成·····	132
二、“不贞”与“赴水”之实·····	136
第二节 父母焚诗辨析·····	162
一、诗歌·····	162
二、词作·····	187
三、父母焚诗辨·····	194
第三节 死亡原因·····	198
一、死亡原因：疾病·····	199
二、不葬于地下与死因有关·····	201
附录·····	207
主要参考文献·····	219
后 记·····	225

第一章 《断肠集序》之殇

魏序的形成，将朱淑真这个文化女性推倒了历史的舞台，同时，序文也是朱淑真及其诗词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最原始的重要资料，甚至具有史料的性质。但古今对序文的认识不够，又在当下的研究中对序文提出了众多的质疑。对此，本章进行必要的说明。

为了论述的便利，先将序文誊录并分段如下：

1) 尝闻摘词丽句，固非女子之事，间有夭姿秀发，性灵钟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虽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蕊夫人，近时之李易安，尤显著名者，各有宫词乐府行乎世。然所脍炙者一二数，岂能皆佳也。

2) 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

3) 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薄命，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

庸夫，固负此升矣。

4) 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

5) 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未为不遇也。如其叙述始末，自有临安王唐佐为之传，姑书其大概别引云，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

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

第一节 魏仲恭与《断肠集序》

魏序是现存最早的记载有关朱淑真事迹及其诗词的一则资料，由于朱淑真史册不载，父母、丈夫不详，因此，魏序就被历代接受与研究者的所倚重。但是，在近千年的接受与研究过程中，魏序的作用与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研究者对魏序提出了质疑。邓红梅女士《朱淑真事迹新考》一文不仅将朱淑真的生活年代界定在了南宋中后期，同时对这篇序文的形成年代提出了质疑，并认为魏序的作成时间不可信。本节将就此进行必要的辨析。

一、魏仲恭事略

1. 字号、官职

魏仲恭的这则序文，始见于南陵徐氏影印元刻本《断肠集》卷首，题“宋通判平江军事魏仲恭撰”，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由此可知：

魏仲恭，字端礼，号醉□居士，宛陵（今属安徽）人，淳熙壬寅（1182）二月，撰《断肠集序》，其职务为

平江（今江苏扬州）通判。

通判，差遣官名在知府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据《事物纪原》卷六和《职官分纪》卷四一载，“唐五府州长史理府事，余府州通判而已。”《嘉靖镇江志》亦载：“唐有别驾，通判列曹。”由此可知，通判之名，唐时就已存在，但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官名称，而作为一固定的职官则是从宋代开始。唐末五代，藩镇武将专权，天下动乱不已，中央集权始终巩固不下来。宋初，统治集团全力解决这个大问题，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就是解除武将兵权的明智之举。武将解除兵权之后，则往往以朝臣身份出守州郡，官名为“权知军、州事”。“权”，有临时之意，意谓随时可以罢去，从名称上亦注意矫正藩镇的父死子继之锢弊。可以说，宋代设通判是为了加强控制地方而置于各州、府，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因此，通判又号称“监州”。因此，宋初通判的选派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郡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和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通判的差选，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后改由转运使、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宋室南渡，通判更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的包括州郡官、县官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具有监察官性质。但直隶州通判级别多数为从五品和正六品，散州通判级别为从七品和正八品。而直隶州知军、州事为从三品和正四品，散州知军、州事为从六品和正七品。南宋平江府，隶属两浙西路，归临安府辖制，因此，魏仲恭所任平江通判应为直隶州通判，为从三品和正四品，其地位亦较为显赫。

魏仲恭之所以能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这得意于他的父亲魏